

中间路线——伊格尔斯眼中的后现代史学

汤锋旺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在现今的史学研究领域中, 后现代主义可谓方兴未艾, 其影响也将不断地深化, 能否对其有科学合理的认识将关系历史学科的发展。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中有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论述的独到见解, 对当今史学界正确、客观地认识后现代史学将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中间路线; 伊格尔斯; 后现代史学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08(2011)05-0078-05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中, 伊格尔斯深刻、清晰地展现了西方历史学发展的整体进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他从分析“一种学术规范的历史学科的确立、社会科学对传统学术研究的挑战入手, 深入剖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对社会科学研究路线的批判及其对历史学家工作的影响”^[1], 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后现代主义史学进行批判性的接受。作者所持的“中间路线”并不是一种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来势汹汹的妥协和折中, 而是从“社会史考察史学史的方法”^[2]对后现代主义史学进行科学分析后所作出的判断。后现代主义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如何对传统史学及新史学构成挑战?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是否意味着历史学存在根基的丧失? 历史研究者应该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诸如此类问题, 伊格尔斯在书中都有其独到的见解。

一、史学本体论——微观史学评析

在史学本体论方面, 后现代主义主要攻击历史的一线发展观, 否认“元叙述”的存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 关于知识的报告》中阐述“知识”与“叙述”的关系时, 提出知识的“合理性”问题需要从知识内部进行考察, 从而把历史知识的“合理性”与“叙述”相结合。在利奥塔看来, 各类“知识”都是遵循一定“游戏规则”的话语活动, 历史知

识也不例外。这样, 话语活动就代替了史学实践活动, 历史知识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在后现代史学思想体系中便无立足之地了。并且, 他指出: 在 20 世纪以前, 这些话语活动都是依仗某些“宏大叙述”而进行的, 并构建起一套“元话语”。而当 20 世纪发生所谓的“叙述危机”后, 利奥塔认为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后现代”就是这种新状态的表征。^{[3]1-2} 据此, “后现代状态”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对“元叙述”或“宏大叙述”的怀疑。进一步讲, 在后现代状态下, 历史学“元叙述”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历史学失去了“元叙述”的功能, 还表现出“历史知识的个别化”^{[4]338}。正如劳伦斯·斯通在《叙述史学的复兴: 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中所指出的: “对过去的变化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科学解释乃是可能的——已经广泛地被人摒弃了。”^{[5]101} 后现代主义对“元叙述”的否定, 不仅使历史学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更使历史观念发生了显著转变。整体史观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变得不可能, 历史也不再具有连续性。微观史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而产生。

伊格尔斯在书中对微观史学的评述是详尽的, 且把微观史学置于整个西方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 从社会和历史的纬度来把握微观史学的优势及缺陷。他首先提出微观史学对宏观历史观念以及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法否定的原因在于: 对技术进步

[收稿日期] 2011-08-17

[作者简介] 汤锋旺(1985-), 男, 福建福安人, 厦门大学历史系, 博士, 研究方向: 东南亚华人社会与文化。

的有益的社会政治后果这种乐观主义的见解丧失了信心^{[5]105}，并列举了微观史学家如卡罗·金兹伯格和卡罗·波尼两位历史学家对现代性的批判，即现代化为特征的世界历史过程，是以人为其代价的。而要“把无名的人从备受漠视之下解救出来，就得号召有一种新的概念上的和方法上的历史学研究途径，它不再把历史看做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看作是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5]105}他把微观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一步指出“没有任何理由说，一部研究广阔的社会转型的史学著作和一部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生存上的史学著作就不能共存并且互相补充”^{[5]107}，他还以梅迪克和柯斯卡的对话为线索，对比了社会科学历史学与日常生活史学各自的基本立场，深化读者对日常生活史学的认识。

同时，伊格尔斯又对德国日常史学与意大利微观史学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之间有共通之处，而德国的日常史学更具有社会科学取向的特点。此外，伊格尔斯还把微观史学与福柯、吉尔兹等人的研究作了比较，指出“他们也像福柯一样，力图表明霸权体已经是怎样排斥了某些思维方式，认为是魔鬼的、非理性的、异端的或有罪的”。但两者之间存在三大方面的差异：一是微观史学一直坚持认为，在历史之外还有一个现实是可以为人知道的；二是微观史学与古老的社会科学共同享有几项基本的设定，使它有别于福柯的和吉尔兹的研究路数；三是微观史学并不完全排斥经验的社会科学，但它强调在方法论上需要以小规模现有的现实来检验他们的建构理论。^{[5]112}在他看来，微观史学并不是一种对传统史学和社会科学史学的全面否定，而是本体论上接受后现代主义史学之后的扬弃和创新。这种融合多元的历史学发展脉络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接受或否定，而是批判性的接受。

最后，作者以微观史学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卡罗·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蠕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和乔凡尼·列维的《继承权力：一个魔法师的故事》深刻、具体地剖析了微观史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所秉持的历史观念。伊格尔斯以具体的研究路数分析向读者展现出微观史学以叙事见长的特点。微观史学的诞生是后现代主义在历史领域作用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传统史学相区别的。但是伊格尔斯指出：“微观史学看来并不是在否

定具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的历史学，而是对它的一种补充。”正如约翰·埃利奥特对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所批判的：如果“马丁·盖尔和马丁·路德的名字一样有名甚至前者比后者更有名的话，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6]77}微观史学在诸多方面一直饱受争议。伊格尔斯在书中指出了微观史学自身存在“事实与虚构”的根本性矛盾，同时指出“‘整体的’或‘全球的’历史这一向往，已经是束之高阁了。但是历史学并未被转化为毫不相关的个体的堆砌。我们已经看到意大利和德国的微观历史学家们尽管专注于地区史，却从未丧失过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语境的眼光”。^{[5]144}伊格尔斯正是通过比较分析，让读者抛弃原先的偏见，更为清晰、辩证地看待微观史学。

“元叙述”的否定就意味着对历史知识的全面否定，对历史劝谕和认同功能的否定，而诉诸于文本之后的历史还能是“历史”吗？国内学界对此也有诸多的解读，但正如陈岂能先生所指出：“在元叙述崩塌，历史学知识出现原子化的情况下，史学要想继续发展，发挥其劝谕性榜样的功能及认同功能，仍必须构建宏观的‘历史语境’，但原子化的史学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7]因此说，后现代史学本体论上是一种悖论，即历史叙述和历史功能的根本性矛盾。微观史学的历史研究实践虽然是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回应，但也没有最终解决在接受后现代史学本体论之后调解两者之间的矛盾。两者之间存在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关系，伊格尔斯在书中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理清，阐明了微观史学是社会科学史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历史学科发展的产物，向史学界表达出了一种客观面对后现代主义的中间立场。其实，除了利奥塔对历史知识提出了巨大挑战之外，福柯有关知识与权力的阐述则是对历史本体的进一步否定。但伊格尔斯在书中的阐述不多，而福柯对历史学的观念影响是巨大的，可谓不无缺憾。然而，后现代简单对“元叙述”否定是不可取的，“虽然元叙述在本性中有可疑之处，但元叙述仍是历史编纂必不可少的整合力量”^{[8]115}。微观史学的研究实践也没有最终摆脱“元叙述”所具有的历史功能，只不过是在叙事与历史真实之间做了比较好的平衡。可以说，伊格尔斯眼中的微观史学就是对后现代批判性历史研究的实践产物。

二、史学方法论——以叙事问题为中心

在方法论上，后现代史学主要依赖于语言学、

文字学、人类学的方法。关于历史学的叙事问题,在传统史学研究中它只是个编撰书写的形式问题,并不会对历史客观事实构成存在威胁。因此,古往今来众多历史学者都是把历史当成一门融合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学科,并以“一定的体裁、结构与语言把研究成果反映出来”^{[9]108}的方式统一于历史研究过程之中。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相互独立并不会动摇历史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当然,这是以艺术性服从科学性的前提之下两者才得以和平共处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在方法论上也是从这个维度欲置历史于文学的境地。叙事问题就成为后现代主义攻击历史学的强大武器,而叙事问题当中尤以语言学方法论为甚,可以说语言学方法论是后现代史学方法论的核心。劳伦斯·斯通在《叙事史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一文中,对历史变化一贯的解释已经不再可能。而后现代主义史学却比斯通走得更远,提出了任何的一贯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在史学方法论上,语言学的方法论代替了史料的分析考据,后现代主义就此否认“历史著作所谈的乃是真实的历史过去”^{[5]123}。而伊格尔斯是如何看待后现代史学中的叙事问题的?

伊格尔斯显然对历史的语言学转向会终结其作为一种学术的地位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自劳伦斯·斯通之后,罗兰·巴特和海登·怀特在历史叙事问题上进一步走向极端相对主义的境地。他们把历史编撰学和小说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并无区别。这种把文艺批评领域中的后现代理论引入历史学给历史学带来了莫大的影响。对此他不以为然,并说道“从希罗多德到娜塔莉·戴维斯都是既承认历史叙述的文学方面,又承认想象力对于建构他们的作用,而怀特在这里远远超出了这一历史思想的传统”^{[5]123}。因此,他分析和思考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理路。知识与客观现实的关系问题,是语言学理论中起中心作用的问题,也是涉及到历史本体论的重大命题。后现代主义欲把历史连根拔起,而又不知建构怎样的历史理论体系。这种盲目性与批判性相混合的趋向是历史研究学者在面对后现代史学理论中应该注意的。能否把这种双重性相剥离,直接涉及到历史学与后现代理论在未来建构历史理论体系的成功与否。伊格尔斯所作的评述可谓是客观、中立。

从语言理论的角度来看,文本并不是指外部的现实,而是全部包含在它自己的本身之内。“对于历

史编纂学而言,这就是意味着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也没有人间演员、人的意志或意图,并且完全没有一贯性。”^{[5]123}因此,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据此提出:历史学和一切文学一样,本质上都是写小说的操作。海登·怀特在其著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提出了“元史学”的概念。而所谓的“元史学”就是要跳出具体历史事实的研究,在历史话语的层面上,探讨历史话语的本质、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关系等史学理论问题。某种程度上,伊格尔斯是赞同海登·怀特关于历史叙述的虚构和想象渗入的观点,但是,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海登·怀特已经走得太远了,“海登·怀特在正确地指出了在构造超越原始资料之上的历史叙述时涉及的种种因素之后,走得太远。变得太激进,以至于他要我们消除或拒绝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就是相信过去确实实地、直接地反映在原文之中。他认为一位史学家如何把丰富的文献组合成一种似乎合理的叙事说明,完全出自于他的自愿决定”^[10]。显然,伊格尔斯对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法论提出了质疑,并认为“历史学有其自身的批评标准,有其共同遵循的学术准则”^{[9]113}。伊格尔斯对待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叙事方法论对历史研究的解构的认识是清晰的,他不仅认识到现代历史学科地位的确立给历史学研究的深入所确立的根本基础,同时也对现代历史主义的崩溃给历史学所造成的困惑进行了反思。

伊格尔斯还针对历史“转向语言学”对社会文化史的几种取向进行了考察,总结了对“转向语言学”的讨论,他认为从巴尔特到德里达和利奥塔德的语言学理论是有助于历史思想和写作的。这主要体现在:“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并不包含有任何内在的统一性或一贯性,每一种历史概念都是通过语言而构成的一项建构,人作为主体并不具有任何脱离矛盾与模棱两可的一项建构,每一种文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阅读和解脱,因为它并不表示任何含混的意图。”^{[5]134}与此同时,他指出:“这种语言哲学却使它自己更好地参与了文学批评而不是历史写作。因为历史叙述,哪怕使用的是紧密地以文学模型为范本的叙述形式,也还是要求勾绘或者重建一种真实的过去更有甚于只是文学想象的那种情况。”^{[5]134}伊格尔斯对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法论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既阐述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叙述方式在某些方面对历史学的裨益,也阐述了这

种方法论对历史科学性提出的巨大的挑战。总之,作者认为这种方法论“把历史拖入了文学艺术的泥潭,使对‘历史事实’的理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11]。正如斯泰德曼·琼斯所指出的:“这不是一个以语言学的解释取代社会解释的问题,而是一个考察这两者如何联系的问题。”^{[5]134}最后,伊格尔斯以卡洛尔·史密斯—罗森堡的话“语言学分歧了社会,社会的分歧也建构了语言”来为自己的立场做总结。基本上来说,这种概括也是符合当今历史学领域的实际情况的。后现代史学试图以文本的虚构性来否定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但是,语言学的转向只会把历史文学化,这给历史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伊格尔斯从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历史学应是两者的平衡,唯有如此才能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阐发历史思想,这也是伊格尔斯对后现代史学叙事问题论述的题中之义。

三、史学认识论——以客观性为中心

在认识论上,后现代对历史学的挑战是根本的,它挑战了现代史学的根基——客观性问题。历史学的客观性问题由来已久,19世纪的西方可以说是历史科学化的世纪,伴随自然科学方法的引入,历史学自身对客观性的追求充满了迫切和渴望。他们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历史是客观的,历史研究的目标是寻求历史的真相,客观地复原真实的历史,兰克被奉为这种信念的典型代表。”^[12]兰克“如实直书”的理念至今为人所感佩。19世纪的众多历史学家在那个充满着信仰的年代对历史科学的执着追求,让整个19世纪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而历史科学职业化所遗留下来的最大贡献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中确立了历史的客观性。但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这种理念就不断受到挑战,如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奇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等命题对历史本质性提出了质疑。“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愈演愈烈,它在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内所产生的巨大效应,使得客观性再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5]155}从此,关于历史客观性问题的争论就成为了史学理论的中心命题。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对客观性问题的阐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历史学知识背后的权力支配,不再将历史作为具有客观性的科学,转而揭示其意识形态特征。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探讨最为典型。而后现代史学理论家詹金斯在

其著作《后现代历史学》一书中对历史知识提出了种种质疑。在他看来,“所有的历史都是诠释的,而且从来不是名副其实的真实。历史为历史学家本身的一种杜撰或虚构物,一种对过去的描述而非反映,一种冒充成真实生活情况的构思行为”,且“历史一直是某些人的历史,而这些人不能成为过去本身,因为过去不具有自我,因此,把特定的历史论述等同于历史本身,不只是意识形态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一派胡言”。^[13]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通过从历史知识的本体出发,对历史知识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强烈质疑,强调历史知识的本质就是意识形态,甚至是意识形态的歪曲。第二,将历史学等同于文学、艺术,根据其创作活动的特点,视之作为一种语言游戏。在这一点上,后现代史学理论中是以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为代表。可以说,海登·怀特把对历史知识的质疑通过语言学的方法论来实现对历史客观性的否定,而这对历史学是致命的。第三,将历史文本化,认为“作者已死”,突出主观解释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文本之外无他物”^{[14]158}。后现代史学理论对客观性的否定不仅是从历史研究对象、历史研究方法上加以否定,同时后现代史学理论也否定了史学工作者的存在意义。

面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来势汹汹,历史学家们不仅表示了担心,同时也予以了强烈的反驳。许多学者还专门写书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著名的有美国学者乔伊斯·阿普尔比等的《历史的真相》、理查德·埃文斯的《为历史辩护》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凯思·文夏特乐的《历史的谋杀》等。^[15]阿普尔比在《历史的真相》一书中就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嘲讽的世界观”,一种“绝望的世界观”,“其极端的形式里没有一般所知的历史学的容身之地”。^{[16]188-189}而埃文斯教授在《捍卫历史》一书中认为历史学科的基础已经动摇,并且“不断重复历史是客观的信仰,提倡回到学者的谦恭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学”^[17]。

伊格尔斯在历史客观性问题上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后现代主义提出的种种知识论问题,“不仅是历史的始终一贯性受到了质疑,而且也还包括有作者的和文本的始终一贯性”。历史知识的直接性遭到否定,认为这不是后现代主义的首创。但是针对海登·怀特的极端相对主义的论点,伊格尔斯引用罗杰·夏蒂埃的评论:“哪怕历史学家是以一种‘文学的方式’在写作,他也不是在‘创作文学’”。在

伊格尔斯眼中,“历史学家总是要检查造假和作伪的,因而是满怀着求真的意念在操作的,不管通向真相的道路可能是何等的复杂性而又不完整。”^[5]¹⁵⁵与前面诸位历史学家相比,伊格尔斯在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客观性问题上的全面否定和质疑,表现出的并不是肤浅,而是从后现代史学理论体系的整体上加以批判和吸收的。一方面,他对极端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表示了激烈的驳斥,这在他同海登·怀特的争论中可见一斑,尽管也有学者认为其反驳显得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但是还是可以体现出伊格尔斯在客观性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研究主题、方法上的影响,伊格尔斯则予以肯定,尽管在后现代史学理论中客观性问题始终贯穿于历史研究的整个过程,涵盖了历史知识、历史方法等方面的阐述。但是,伊格尔斯的立场的根本立足点正是基于历史客观性的不容质疑,及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某些方面的吸收。

四、综述

本文通过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的研读,对伊格尔斯从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脉络出发,以社会史的视角审视西方历史哲学,尤其是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刻、清晰的论述。笔者从史学本体论、史学方法论、史学认识论三个方面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对话,来阐述伊格尔斯眼中的后现代历史学。伊格尔斯的这种批判性的接受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着当今历史学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当然,这种审视的角度是基于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纬度出发的,因此,篇章上难免存在诸如德国史学中心倾向、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批判单薄等问题。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作者的研究是严谨和科学的,这是本书最大的学术魅力。当今中国史学界有关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讨论是方兴未艾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启发之下的思考和研究,也在进一步地开展,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深刻影响之下的反思显得尤为重要。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备受关注,能否在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之间另辟蹊径成为史学界的重要论题,而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

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对此的讨论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 [1] 程群. 反思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读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J]. 历史教学问题, 2004(6): 50-53.
- [2] 王海涛. 历史学: 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J]. 东岳论丛, 2004(6): 32-35.
- [3] [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后现代状态: 关于知识的报告[M]. 车槿山,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 [4] 姜芾. 西方史学理论和流派[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5] [美]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M]. 何兆武, 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 [6] [英] 玛丽亚·露西亚·帕拉蕾丝.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M]. 彭刚,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7] 陈启能. “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J]. 东岳论坛, 2004(2): 6-11.
- [8] 韩震, 孟鸣岐. 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 [9] 张耕华. 历史哲学引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 [10] [美] 乔治·伊格斯. 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对海登·怀特历史编纂方法的反思[J]. 王贞平, 译. 史学史研究, 2008(4): 1-8.
- [11] 潘娜娜. 巴克尔的历史哲学初探[J]. 求索, 2006(2): 144-146.
- [12] 赵立行. 后现代主义的启示与历史反思[J]. 史学理论研究, 2004(2): 12-14.
- [13] 张仲民. 后现代史学理论述论[J]. 重庆社会科学, 2005(3): 59-64.
- [14] [法] 雅克·德里达. 论文字学[M]. 汪堂家,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15] 杨共乐.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J]. 史学史研究, 2003(3): 71-75.
- [16] [美] 乔伊斯·阿普尔比. 历史的真相[M]. 刘北成, 薛绚,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 [17] 张仲民. 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认识[J]. 史学理论研究, 2004(2): 147-151.

(编辑 申嫣平)